

汉文本《十二国》的成书时间、原文出处及内容特点

□ [俄] 索罗宁 著 栗瑞雪 译

摘要：本文是索罗宁所著《十二国》（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的导言部分，原书由彼得堡东方研究中心于1995年出版。文中指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收藏的西夏文刻本《十二国》译自中原俗史书，原书不是一部纯历史著作，而是在中国早期史学传统影响下出现的训诫故事集。

关键词：俗史书；国别史；十二国；西夏

作者简介：索罗宁（К. Ю. Солонин，1969—），男，俄罗斯列宁格勒市人，台湾佛光大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夏学；栗瑞雪（1973—），女，重庆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俄国历史。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写本部收藏着一本题为《十二国》的西夏文刻本（科兹洛夫收集品，Танг-12）。现存部分不完整，原书上、中、下三卷，仅存卷上和卷中。这两卷书保存状况良好，但其中略有残佚，难以做到全文的翻译。著录的书题《十二国》是抄录了位于版口的简称，书的全称尚不得而知。现存部分没有序跋，无法确定该书译成西夏文的时间。

《十二国》辑录了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前8—前3世纪）的一些故事，包括发生在晋国、齐国、后齐（田氏）、魏国、鲁国、赵国的史实。叙述史事按地理分布原则：述及一个国家时分作若干章，却不管时间的先后，材料编排有些混乱^[1]。比如在齐国篇里首先提到的是齐景公（前548—前490年在位），然后才是齐桓公（前685—前643年在位）^[2]，而有关孟尝君的著名典故则被放在了其父靖郭君在世时发生的故事之前。

《十二国》中的每一“国”都以简短的引言开篇，引言中包含了该国创始人的资料、对周王朝的态度、该国何时成为霸主以及何时因何而灭亡。^①

由于不知道完整的书名，所以无法指出《十二国》的汉文原本名称。也许，保存在俄罗斯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的这个译本出自《宋史·艺文志》著录的作品——宋

代孙昱所著《十二国史》十二卷或《十二国史略》三卷^[3]。由于西夏本《十二国》为三卷，人们自然会想到这个西夏文本就是《十二国史略》，但无论是西夏本还是汉文本，这两部文献都未流传下来，迄今仍不为人所知，任何勘同都只能是假设。这种勘同不可能只根据《十二国》这一部著作，《宋史·艺文志》中提到了一系列作品，同样也把这部著作列入其中^②。最后不排除一种可能，即该书根本不是从汉文本译来的，而是依据西夏国内各种不同汉文作品编纂的中原历史故事集。克平研究的《新集慈孝记》可以作为这种编著的例子^[4]，但该著作的特点是在叙述史实时遵守事件发生次序的连贯性，并根据中国通用的规范按题材分类组织材料^③。因此，《十二国》的叙述有些杂乱无章，这正好驳斥了该书是在西夏编纂的观点。这部著作多半还是译自汉文本。

把这部书与古汉语的类似作品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澄清《十二国》的原著问题。在没有原著的情况下不可能直接进行文本分析，因此不得不考虑一些纯形式的标准：其他文献中存在内容相似的片段、人物名字的差异和论述同一事件时的差别等等。为了证实《十二国》中故事的同一，我利用了以下汉文作品——司马迁的《史记》、《春秋左氏传》、《国语》以及汉代刘向（前79年—前8年）的著作《说苑》、《新序》、《战国策》。此外，还用到了《韩诗外传》、《吕氏春秋》、《韩非子》和《列子》。

在早些时候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认为《十二国》可能与《说苑》之类著作有些相似^[5]。可是，与《十二国》的结构和内容相似的文献绝对不止有《说苑》。

根据地理原则排比史料是中国早期史书的典型特征之一。作为最早史书之一的《国语》正是这样写成的。还有《战国策》，据编者刘向指出，也属于他早年校订并补充的、“因国别”的作品。《国语》和《战国策》这两部书都遵守所述事件发生次序的连贯性，而且《战国策》完全是刘向的校订成果^[6]。《国语》也是经校订而成，尽管不清楚谁是该文献的作者、又是谁在何时校订过它。

因此，中国早期俗史书的特点是按地理特征组织内容，叙述有些杂乱无章，后来的编撰者克服了这一缺点^[7]。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从结构来看，《十二国》源于刘向编写或校订的《战国策》及其他作品，以及《国语》在某种程度上建立的古代俗史学传统^④。作为对《十二国》古代原本有利的补充论据，它与马王堆出土的文献有些相似。马王堆所出文献中有战国时期的27个历史故事，和《十二国》一样，其特点也是内容编排杂乱无章和不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

研究相同故事的具体情形也可以补充解释《十二国》原本的出处问题。但是书中有些故事，在古代汉文史书《春秋》、《左传》和《史记》中实际上找不到对应的内容。《十二国》只有两个故事（《后齐》篇的第二章和第五章）和《史记》完全一致，其余所有的章节还要参照其他相关汉文史料进行甄别。《十二国》与《史记》中的故事虽然相似，但还不能把它们直接对等起来，这两部文献在叙事时总是有些差异。

《十二国》的现存章节记录的主要是战国时期的故事。春秋时期的故事只是在《鲁国》、《齐国》和《晋国》篇中有所涉及。《晋国》篇的三个故事（“谴责赵盾”、“晋景公生病”和“城濮之战”）与《春秋》相符，但《春秋》对这些故事的叙述与《十二国》有很大差异。《春秋》记载，赵穿杀死晋灵公之后，赵盾逃离了晋国，后又回国，遭到史官董狐的谴责。孔子惋惜赵盾名誉受损，称他是一位好官，而《十二国》记述的则是孔子指责赵盾最后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关于晋景公生病的故事，《十二国》的叙述也与《春秋》

不同 《十二国》讲的是景公善待医缓，而《春秋》则强调这位昏君因生活荒淫而生病，且无人能治，后来掉入茅厕，死得毫无尊严。这些差异使我们得出结论说，《十二国》的题材在来源上与《春秋》、《左传》或其他编年体史书没有关系，而是源于另一种可能属于以《战国策》和《国语》为代表的民间别史，其中自有一些偏离正史的记述^⑤。而且，《十二国》有自己的时代范围，比《国语》或《战国策》更广，书中涵盖了春秋和战国时期，《十二国》讲述春秋时期所发生事件的篇章与《国语》一致的比较少^⑥。该西夏文本的内容主要与《战国策》和其他著作（主要是《说苑》和《新序》）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西夏文本与相应作品可以勘同，那么这些故事的汉文本与西夏文本就相当符合。因此，《十二国》《鲁国》篇第十章和十一章的故事就像《说苑》记载的那样，是按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叙述的。有两个故事（《鲁国》篇第十五章和《齐国》篇第三章）是根据《韩非子》确定的，而且这两个故事在汉文本的同一篇中^⑦。有一个故事（《鲁国》篇第五章）可以勘同《吕氏春秋》，除了故事人物名字略有异读之外，西夏本与汉文本的内容一致。在汉文献中只有《吕氏春秋》收录了这个故事，但在人物名字上与西夏本略有出入也可以解释为一种迹象，表明编入《十二国》的这个故事并非源自《吕氏春秋》。

然而，并非所有的故事都与汉文献一致。想必西夏文《十二国》的汉文底本不是从著名的文学作品编撰而来，而是另有来源，不止包括刘向本人作品之类的常用文献。因此，当《十二国》的内容与其他作品等同时，正如前面指出的，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确实极其相似，但不完全同一。在此基础上，似乎很难认定《战国策》、《说苑》、《新序》、《韩诗外传》之类作品就是编写《十二国》时的参考。这多半都是同一类型的作品，源于中国早期编纂史书的一种传统，源于复杂而有趣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题材也可以作为任何一种政治思想或智慧的例证。因此，《十二国》完全可能不是源于宋朝的编撰本，而是更古得多的中国史书编纂传统。这可以用几点推测来证明。

首先，《十二国》的内容没有任何劝世意义，甚至每篇开头的简短序言也只含有大量信息而没有道德评价。故事表现出的“素朴实在论”和“唯史实派”占首要地位，瓦西里耶夫认为这二者是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特点^[8]，而且故事的趣味性在选材时不起决定性的作用。

其次，以下论据证明了《十二国》的全部故事都十分古老 《鲁国》篇有两个故事——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的叙述不能认为等同于孔子弟子宓子贱担任单父宰时的活动。关于孔子这位爱徒的情况鲜为人知，流传至今的、有关他的故事都收录在《吕氏春秋》和《新序》中^⑧，而且内容彼此重复，但这些书中没有一本包含《十二国》那两章中的故事。有关宓子贱或宓子本人的情况，注释者只是介绍说，他研究过古代世界，又名不齐，姓氏读作 fú。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得知，有 16 篇作品都是由称作宓子的宓子贱编写的^⑨。后来再没提到这些事。如果假设，根据与《晏子春秋》相似这一点来类推，宓子的文章不是宓子贱本人所写，而只是关于他的故事，那么《十二国》中关于宓子贱的内容也完全可能是源于宓子的作品。因此，《十二国》的原文应当是汉初编写的，这和《十二国》原文或原文的雏形与刘向的有关作品相应的情况是一致的。

《十二国》在结构上近似于一些源于中国古代叙史传统的文献，如具有代表性的《国语》和《战国策》等。这些文献与《十二国》有确定无疑的相似之处，虽然各自的故事有其独特性，但是可以假设，上面提到的全部著作，包括《十二国》的汉文原本，都源于—

组形成于战国末期和西汉初年的主流历史故事。在没有统治思想的时期，随着官吏阶层政治经验的积累，这些故事越来越具有综合性。因此，这些故事与其说是意识形态的表现（后来具有了这种功能），还不如说是政治上灵活与务实的例证。我们在《战国策》、《新序》和其他文献中发现的也正是这些特点^[9]，这些特点对于《十二国》的汉文底本来说也是典型的。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十二国》汉文底本故事的综合性源于中国古代编纂史书的传统，作品本身可以认为与刘向的作品同步。

要准确判断《十二国》被译成西夏文的时间是不可能的。但可以提出几点看法：该译本大约完成于12世纪中期。西夏在11世纪中期就已经开始尝试把汉文作品译成西夏文，但直到12世纪中期前，在成立了翰林院（1162年）和所谓的“内学”（1148年）之后，才真正开始大规模的翻译活动^[10]。正是在12世纪中叶编写出了与《十二国》功用相近的《新集慈孝记》^[11]，并完成了汉文本《类林》的翻译^[12]。大致可以说，西夏译本《十二国》是在12世纪中叶前后面世的。通过对西夏刻本的印面进行分析也可以证明这一结论，根据间接的特征，可以确定这件刻本也是12世纪中叶的^[13]。

二

上文已经讲过，在《十二国》、《战国策》和其他一些作品之间有大量故事是吻合的。与《战国策》相应的故事构成了《十二国》中最显著的一组内容。这也说明，大致从战国时代开始，已经有较多的历史故事流传下来，与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相比，故事范围也有比较明显的扩大。如上所述，由于《十二国》与汉代文学作品（如《说苑》、《新序》、《韩诗外传》等）具有相关性，我们可以推测有一组完整的文献，上述所有著作中的故事都来源其中。

考虑到《十二国》与《战国策》的来源相同，可以推测这两部作品的内容有某些相似，但它们之间也有非常重要的区别。

首先我们注意到，《十二国》所录战国时期的材料没有《战国策》全面。即使只根据《十二国》中流传至今的田氏《后齐》篇，也能相当清楚地发现这一点——《战国策》用了六篇来叙述齐国这一时期的历史，而《十二国》总共才用了一篇。

《十二国》和《战国策》叙述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正如瓦西里耶夫所指出的，《战国策》叙述的主题往往不是某个人物，而是一系列具体的历史事实，其中人物的简短话语是为了更直观地重现历史原貌而作出的说明^[14]。而在《十二国》中，只有一个故事关注的是事件本身（《后齐》篇中的第三章——田单守即墨）。在西夏文本中，叙述的主题就是故事主角所讲的话和表现出的智慧，而事件本身只是突出故事人物言语智慧的背景。但《战国策》本身也有不少辞藻华丽的故事^⑩。

瓦西里耶夫认为《战国策》中缺少对事件的道德伦理评价——这些事件有的被解释为政治智慧的结果，有的则表现出官员或统治者的无能——《十二国》也不例外。而且，西夏文献的作者常常会忽视一些史实，而这些史实能证明历史事件与某人所起作用之间的直接联系。比如在第五篇中，齐国（吕氏）的灭亡就与齐景公曾经悲悼的晏子去世有关。但众所周知，齐景公去世后，吕氏齐国还存在于相当久（到公元前379年正式结束，即齐景公死后还存在于几乎一百年）。

《战国策》的作者试图突破官方编年史那种述而不评的典型传统，他们努力从客观必然

性的角度解释历史事件，展示这些事件在参与者的动机和意图影响下发生的规律，类似的宗旨使得《战国策》的作者和编者能把时间上接近的史实排列在一起来明确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15]。同时保持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于每个国家来说，该国君主执政的顺序就是时间先后的坐标，而《十二国》的特点却同样是完全没有任何时间顺序。《战国策》中严谨的时间顺序都是后来编订的结果，为的是尽力重现编年体记事的因果联系^[16]。正如马王堆出土文献所证明的，在《战国策》和《十二国》一类著作中，从来都没有按时间顺序的、连贯的叙述。正是所述材料的杂乱无序，证明它们接近于一种曾存在于正式编年体范围之外的、特殊而丰富的历史传统^[17]。于是，作为一本未经后世（到宋代之前，也就是10世纪前）编订的著作，《十二国》表现出了这一传统存在的更古老阶段。瓦西里耶夫解释说，古代史学的“特殊传统”表现为一种假定的、以某种方式记载同时代人——统治者、军士、纵横家的言论并评价历史事件的口头传统^[18]。我们认为，把君臣的言论收录到故事中以利于口传全书的继承性，并且尝试对历史文献进行加工整理以明确连贯的时间顺序和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这都是后来编订的结果。因此，重点记述人物的言论、不带编订痕迹的西夏文本更符合民间史学的古代传统。被瓦西里耶夫定义为体现早先政治传统载体思维特征的“素朴实在论”，也可以论证那些完全由言论构成的古代故事，因为当时人们的观点还未被任何统治思想束缚^[19]。

《十二国》中的故事往往都是表现古人实用主义的例子。《鲁国》篇第八章的故事在这方面很有代表性。故事讲的是鲁国大夫展禽以鲁国曾经的威望说服了齐僖公，让他放弃进攻因干旱和饥饿而衰弱的鲁国。明白了即使打败齐国自己也不能获得更高职位这一道理的楚国大将昭阳（见《后齐》篇第六章），以及宁让敌人得到熟麦也要为来年保存种麦人的宓子贱（见《鲁国》篇第六章），都是政治实用主义、甚至是个人实用主义的范例。已猜到田成子要叛乱而装糊涂、从而在叛乱时逃脱的齐国大臣隰子则表现出讲求实际的智慧（见《齐国》篇第十章）。如此这般的故事都包含着春秋战国时期的实践、政治与日常生活的智慧。从逻辑上可以假设，历史故事试图记录事件并从中吸取教训以利将来，所以用人物的言论作为教诲的手段，而对事件本身的描写可以退居其次，只简单给出该言论的政治背景和后果就行了。对事件的叙述可以简化为标准的起首套话，比如“某王攻某国……”、“王曰……”、“或曰……”等等。故事的结尾也千篇一律，“兵败……”、“王羞……”等等。在这类故事中不叙述具体的事件，所有的寓意都蕴含在言论中（与《国语》相比）。

因此，《十二国》中有些故事不仅从实用主义和素朴实在论的角度表现出政治与生活中的机巧，在口传历史故事和古代俗史书（史论）中也有表现。很明显，《十二国》中的历史故事流传至今的都是中国古代文学演变的最完整作品，它们具有最系统化的形式和口传作品典型的格言因素。可以不把《十二国》仅仅认定为一部历史著作（因为它在讲述历史时情节不丰富、缺乏因果联系、时间顺序混乱），它更多地是通过叙述历史故事来教给读者一些从政的实践智慧。因此，故事的历史背景——尤其是在讲到从时间顺序上看属于后来才发生的事件时，就退居次要地位或几乎完全消失了，从而使主要内容对于所有时代都同样有价值，这似乎消除了其历史局限性。

《十二国》中没有像瓦西里耶夫在《战国策》中分出的那些政治和政论片段（类似抨击性的话）^[20]。《战国策》中有这样一篇文章——讲顿弱与秦始皇的谈话，把后者叙述成一个凶暴而昏庸的统治者。瓦西里耶夫指出，这个故事在秦汉战争（前209年—前202年）

时被记录下来，并用来当着其臣民和盟国的面责难帝王^[21]。他认为这是一篇具有政治抨击性的政论作品。在《十二国》中没发现类似的章节。对此可以解释说，该片段（以及类似的片段）也许只是出自特定的原因才出现在特定的时间而未能成为口传故事，看来那只是作者的创作。在这些片段中，对历史的兴趣退居其次，让位于对政治的喜好^[22]。这些抨击性文章保持意义的时间不长，不一定会被列入那些与训诫有关的章节，后者以上面指出的那些适于消除历史局限性的历史故事为例。在流传至今的《十二国》中没有类似的抨击性章节，这间接证明了这一作品产生于公元前3世纪末（同时应当考虑到，《十二国》的内容并不完全为人所知）。

《十二国》中还有一些劝谕性内容，与宣扬传统道德和并非总是纯儒家的生活宗旨有关。《鲁国》篇的第三章可属此列，故事讲的是公父文伯的母亲对儿子去世的反应。在文中，母亲谴责儿子对自己的妻妾过于忠诚，而对自己的父母缺乏应有的尊重。换句话说，公父文伯被指责缺乏最重要的传统美德——儿子对父母的孝。而且众所周知的是，公父文伯的母亲在鲁国享有贤妇的美名，连孔子都说她懂礼仪，因此她说的话就带有道德准则的性质^[23]。

可列入劝谕性故事范畴的还有《十二国》中叙述孔子生活的一些故事，但不可认为所有的故事都是对他的颂扬。《鲁国》篇有大量类似的内容。其中首先应当研究的是第十、第十一和第十二章——内容不多，讲述的可能是孔子生活中的真实故事，尽管在《论语》和其他典籍中没有描写，但在民间口传故事中十分流行。这些故事，尤其是讲述皋鱼（《十二国》中的丘吾子）哀悼父母的第十章在中原十分流行，皋鱼悲痛的形象已经成为一个普通名词，甚至被收录在《汉俄大词典》中。

这个故事（就像《十二国》中它后面那篇和《说苑》中孔子遇见捕鸟人的故事一样）的价值在于它揭示了对“孝”本身的中国式理解。在汉文文献《韩诗外传》和《说苑》中，叙述以上故事时附有作者的小结，在内容不够详细及有歧义时，刘向本人对事件作出了正确的解释。类似这种详尽解释和弄清其他情况的努力使研究者免于臆测和过度随意的解释，从而能正确地诠释故事。

让我们回到关于丘吾子哀悼的第十章，它被收入了汉代作品《韩诗外传》^①和《说苑·敬慎》。在《韩诗外传》中，故事的结局不是主人公的死，而是孔子说的相当冗长的话。他给弟子们分析了发生的情况，得出了乍一看令人难以置信的结论，他认为皋鱼完全不是孝顺和守责的典范。为了证明自己的话，孔子引用了一句《诗经》（关于皋鱼的全部故事本身就是对这句话的注释：“父母孔迯。”^②在此应该引用孔子与弟子谈论此事件的完整译文，他们是该事件的证人（皋鱼已经自杀，部分弟子已经各自回家孝养父母）：

子路曰：“有人于斯，夙兴夜寐，手足胼胝，而面目黧黑，树艺五谷以事其亲，而无孝子之名者，何也？”孔子曰：“吾意者，身未敬邪？色不顺邪？词不逊邪（与其说孔子这时谈的是皋鱼，不如说是在讲子路本人，后者性格狂暴粗劣。——作者注）？古人有言曰：衣与，食与（即认为这些东西很重要。——作者注），曾不尔。即子劳以事其亲，无此三者，何为无孝之名？意者，所友非仁人邪？坐，语汝：虽有国土之力，不能自举其身，非无力也，不便也。是以君子入则笃孝，出则友贤，何为其无孝子之名？诗曰：父母孔迯。”

孔子再次强调，内在的恭顺和为父母的利益而劳作必须与儿子外在流露的情感相结合，

否则根本谈不上孝。另外，从孔子的言论中还可以知道，他认为孝是主要的美德，是与仁者、贤人的友谊这种概念的基础，它能为晋升提供保障——因为孔子认为不仁不贤者本身不应当升迁或提升别人。孝是家庭的核心，因为家庭是国家的基础，有了孝，家庭和国家才会稳固，而一个拥有这种品质的人才是高尚的，并能得到很多¹³。孔子引用《诗经》的话证明了这些思想。因此，皋鱼完全不是孝子的形象：他离开父母去远游，即是不孝；事业上不能升迁，表现出不仁不智；没有结交仁义的朋友和组建家庭，则再次表现出不贤不孝，自杀只是加重了他自己的罪过。在《说苑》中有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其中孔子并非偶然地对弟子们说道“弟子记之！此足以为戒也！”¹⁴在《说苑》中，有关丘吾子哀悼的事件和捕鸟人的故事（《十二国》第十章的故事）被放在了一起，即《十二国》的编者多半也是从该文献中摘录出它们，其作者刘向还为这些文章增补了某种类似后记或总结的文字：

修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亏，谗谀乱正心，众口使意回，忧患生于所忽，祸起于细微，污辱难湔洒，败事不可后追，不深念远虑，后悔当几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祸之马也；谗谀者，穷辱之舍也；取虐于人者，趋祸之路也。故曰去微幸，务忠信，节嗜欲，无取虐于人，则称为君子，名声常存。怨生于不报，祸生于多福，安危存于自处，不困在于蚤豫，存亡在于得人。慎终如始，乃能长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引自《论语》——作者注），是谓要道也。

从这一节可以看出，丘吾子受指责是因为他的行为不慎重，因而不符合中庸之道，该原则以隐晦的方式在该节的最后部分被表述出来，即必须回避极端状态、避免大富、赤贫等等。在西夏文本中，捕鸟人的故事（第十篇）看上去更符合该节中表述的刘向的思想，也强调了经验和谨慎的重要性。这个故事在《说苑》中的表述稍有不同，大概把“吸引与认识人”的必要性看作是中国最古老的美德之一。看来在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足的情况下，这个术语可以直接表示把人口吸引到自己国家，如果来的人很多，国君就获得了“仁”的美名；如果没有人来，那国君就是残暴的。在刘向之前的时代，由于国君或大臣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这一术语获得了“使人心接近”的意义。不过，这种假设需要更明确地弄清楚。无法精确说出读者在了解了上述两个故事之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联想，但很明确的是，这两个故事无论如何都与整个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联系了起来，因为这两个故事只收录在这两本儒家的文集中。

可以说，对刘向和韩婴作品中的故事不该像这样解释，因为这些著作都是编的，其中故事都放在道德训诫之前。不过这些故事都是在西汉末年某种劝谕传统的框架中挑选的，此外还可以假设，到12世纪之前，已经不能把故事本身和刘向及韩婴对它们的解释分开了，这二人被认为是相当权威的学者。

最后一个要详细叙述的故事是《鲁国》篇第十二章关于孔子与荣启期的会面。这个故事也相当有名——《说苑·杂言》中有，《太平御览》中的引文和《新序》一样¹⁵，但看上去最流行的版本在道家著作《列子》中，尽管西夏文本和《列子》中的内容小有差别。这里选用《列子·天瑞》来作分析和对比，正是因为这个故事被有意地添加了相同的内容¹⁶。故事本身开始之前有一个长篇的理论性前言，与故事的主要部分相对照，被分析的故事本身只是例证。文中分析的部分讲的是存在与虚无之间、后天与先天的东西会时常转换，还

谈到“理”——生命的本体就像这世上的一切，必然会终结：完成自己的功能之后，必将归于虚无。于是，人的身体将会死去，而他的灵魂将变成“气”，骨肉与产生它的大地相混合，因而返璞归真。人将会找到自己的终点，这是无法抗拒的。在经过一生的四个阶段之后，人将回到自己在娘肚子里完完全全的胎儿状态——外物不能伤它，也无美德可修（也就是说，一生圆满）。

在这个故事中能明显看出道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的对立，而且认为不违背事物自然进程的道家思想更好，在这一自然的过程中能实现尽善尽美。故事中孔子没有对荣启期的生活目标发表任何言论，这可以让我们假定孔子接受了荣启期的观点，未加评判，或许认为这与自己的观点相符。

因此，《十二国》中带有政论说教性质的文章，有很多是倾向完全不同的——既有道家的，也有儒家的。而且《十二国》未对它们任何一种体系表现出明显的喜好，讲述这些文章的内容时采用了平等的方式，说明这部文献可能成书于百家争鸣时期。《十二国》中，儒家的教育作用与“素朴实在论”及政治家的经济论被同时表现出来；孝子的理想与顺利升迁的实用目标在此得到成功的结合，升迁需要政治上的随机应变，该文献中也有这样的例子。《十二国》中的其他故事也确切地证明了必须采取实用和现实的方法，要求国务活动家有分析政治局势的能力，能对形势的发展作出预测，有时还要为了本身或者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

这些文章中值得一提的还有《齐国》篇的第三章（关于大臣隰子心知田成子的野心而嘴上不说，因此在后者发动的叛乱中得以脱身的故事）。在《韩非子·说林》中也有这个故事，《说林》中收录了一些在必要性和实用性的总体思路下排列在一起的故事。让人感兴趣的是，《韩非子·说林》开篇讲成汤伐桀时，为了粉碎敌人的反抗，出于对国家利益的总体考虑，以轻视仁政的思想而威慑天下，隰子则因为准确理解了形势而得到个人的好处。《鲁国》篇第十五章的故事说明了研究某地区经济状况的必要性，此文也收录在了《韩非子·说林》中。确实，在南方的越国，如果人人出门都不怎么穿衣，光脚走路，那他们谁会需要鲁国人制作的鞋和衣物呢？制鞋匠和纺织女将会失业，因为他们不了解这个南方国家的市场情势就决定搬迁到越国。

《鲁国》篇第六章的故事大致讲的是公职阶层从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吸取的主要教训之一：国家机关的职务也受到类似市场规律的因素以及利益和需要的调节，必要的时候，国君会请很多人来做官，就像早间集市上那么多的商人；不需要他们了，就把这些官员都撤掉，这与国君个人的喜好无关。谭拾子对孟尝君说：“……自古以来任免官员的制度就是这样，这是理之固然者。”按照《战国策》中的叙述，谭拾子的话说服了孟尝君，后者甚至削去了五百牒，上面想必写着自己受齐王压制的全部委屈。

也有必要研究一下《齐国》篇的第二个故事，而且，《晏子春秋》的表述更完整地恢复了对该故事的传统理解。晏子遇见一个叫越石父的人，后者被卖作奴仆顶债，他的智慧震惊了晏子，使晏子对他保持礼遇。身为君子的晏子把小人物越石父尊为君子，认为他对自己有用而把他留在家中。这个故事《晏子春秋》比《十二国》叙述得更详细些，尤其是越石父解释自己的行为看似奇怪的原因这一部分。晏子听完这些话后，看到了他充满真理的面孔，理解了他的智慧，于是迈过阶级差异的门槛，恭敬地对待越石父。由于在《晏子春秋》中，晏子对越石父所言反应更明显，因此引用全文如下：

“臣闻之，士者诎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轻人之身，不为彼功诎身之理。吾三年为人臣仆，而莫吾知也，今子赎我，吾以子为知我矣；向者子乘，不我辞也，吾以子为忘；今又不辞而入，是与臣我者同矣。我犹且为臣，请鬻于世。”晏子出，见之，曰：“向者见客之容，而今也见客之意。婴闻之，省行者不引其过，察实者不讥其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婴诚革之。”乃令粪洒改席，尊醢而礼之。越石父曰：“吾闻之，至恭不修途，尊礼不受槟。夫子礼之，仆不敢当也。”晏子遂以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则德，德则骄。晏子有功，免人于厄，而反诎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全功之道也。”^⑦

看来，西夏文本实际上是按照《晏子春秋》的讲述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个故事的结尾。在这几句话中包含了整个故事的实质和对它的评价。如前所述，这里主要是强调了晏子具有超凡的美德这一优点。晏子的美德不仅在于他从危难中挽救了自己的同胞——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必须的，而且在于他作为君子去向一个地位比他低很多的普通仆役致敬，并尊其为君子。他这样做是因为越石父的智慧震惊了他，使他明白后者必须留在他家里。

中国古代传统认为，预测政治形势和事件发展的能力是比较重要的。《吕氏春秋》的作者指出，是否具有预见或预知的能力，这可以区别贤良与凡人^⑧。在《吕氏春秋》的这一篇中，对预知才能的总体论断为讲述郈成子预言魏国将发生政治变革的才能作了开场白。这个故事实际上完全等同于《鲁国》篇第四章的故事。关于这种预知到底是什么，初步的解释是：

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征表。无征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征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郈成子、吴起近之矣。

从这个片段中可以得出结论，预知可以带有完全实用的政治性，就像郈成子那样（《十二国》中的齐成子）。但是正如《中庸》所说，预知不是神秘的醒悟——“至诚之道，可以前知”^[24]。真诚是最高认识的结果以及整顿家庭与国家的基础之一（诚者，天之道也）^[25]。真诚也是儒家自我完善的结果，因而与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孝有紧密的联系。因此，政治生活中的无价品质是信奉自我完善的结果，也是孝这一总概念的组成部分。可以把这种统一视为儒家思想和要求政治实用主义之间更深入的统一。

《十二国》中还列入了对国君的训诫。《齐国》篇第一章讲述大臣弦章针对齐景公的言论，可以作为这种训诫的例子。弦章认为官员的品质与国君的道德水平及能力有关，如果国君昏庸而残暴（像景公一样），那官员就不可能忠诚；如果国君贤明（像桓公一样），那官员也会类似管仲。

因此，《十二国》收录的是与春秋战国时期某些口传史事有关的章节，这些章节有时以人物言论的形式表现出对事件的评价，包含了带有现实政治智慧的建议。这些建议出于实用主义立场，从具体利益考虑，也论述了政治家必备的品质——能进行预测，能看出人们具备何种对己有用的特点，在政治动荡时不灰心丧气。故事中的历史本身不作为叙述的对象，但作为实用建议的背景。这种情况下，多半倾向于对具体历史情景进行抽象的叙述，超越了历史与时间的局限，可以说是获得了超时代的性质。这一系列实用的训诫和一组说明儒家美德的故事密切相关。对照这些故事，可以揭示出儒家学说与通常的政治实用主义之间具有深远的联系，政治实践得到了儒家的论证。反过来，儒教在形成时期还汲取了当

时政治生活中的先例，不仅是把目光转向过去。此外，《十二国》的章节中还有一些故事与道家和法家的传统有关。用同样的态度介绍各种传统，这实际说明了它们在《十二国》成书时的地位平等，这让我们判定这部文献的成书时间是在战国时代或汉代初年。《十二国》的全部故事都以作者有趣、精彩、不同凡响的描写见长。整体上，《十二国》可以被认定为一本历史题材的实用训诫文集，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历史著作。

如果不研究《十二国》在西夏所发挥的作用，仅把它作为文学作品进行分析，那是不完整的。为了完成这项任务，必须从整体上研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曾在西夏流传过的一系列中原文献。

译自汉文的作品可以分为几类：汉文典籍译本（《孝经》、《论语》、《孟子》）；汉文军事著作译本（《孙子》、《六韬》、《三略》）；各种劝世故事集，类似《新集慈孝记》或《德行集》；各种非儒家的甚至是有反儒教倾向的伪书，像《孔子和坛记》^[26]。因为《十二国》被确定为历史训诫类作品，因此它可列入劝世著作的译本。

《十二国》看来不是一本孤立的著作，该书是与另外一些描写中原生活方式与汉人智慧的作品同时公诸世上的，后者对汉人智慧的解释达到了流行的程度。正如已经指出的，《十二国》的训诫热点在于政治家的实用智慧，也就是以从政为目标；同时，性质上与之相似的作品《新集慈孝记》强调的是家庭生活的传统美德，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孝。而且，这两部作品又彼此关联，其基础概念是政务应与个人家庭美德的水平相符。相应地，分类编写中原各种著名活动家（无论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故事的《类林》也属劝世作品，可以把《十二国》、《新集慈孝记》和《类林》算作一个系列。假定，流传至今的这三部著作构成了一个统一的综合体，解释个人、家庭道德与政务的问题很受欢迎，并证实了日常生活中这些方面相互之间的紧密联系。这种综合可以用《大学》中的语句来解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27]

但是正如已经提到的，《十二国》在整体上不承载像《新集慈孝记》这样重的思想负荷：其主要内容仍然是实用的政治智慧和机巧，这些内容在稍晚的阶段才被赋予儒家本身的意义。《十二国》的大多数故事都持中庸思想，本身没有像《新集慈孝记》那样典型的劝世成分，这表明《十二国》与战国时期诸国林立的情况下存在的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传统有紧密联系^[28]。该文献只能与其他本来就具有劝世性质的作品如《新集慈孝记》或《德行集》等综合在一起，才能起到劝世作品的作用。也只有这样，《十二国》的大部分故事才能从训诫方面加以解释。

类似上述从训诫角度阐释日常生活、个人道德和国家生活所有方面的综合体，只可能形成于儒家典籍《论语》、《孝经》、《孟子》在西夏确立了思想体系之后，或二者同时形成也是可能的。中原的学说首先被受教育阶层接受，而对于引用生活事例的流行文学，可能稍后才会需要。看来，既可以说《十二国》与高雅文献（儒家的经典作品）有些相符，也可以说它是趣味流行文学的统一体系，目的是从日常生活与实用主义的角度解释道德，确定高尚道德品质的价值及其对个人成功的实际益处。对于类似的作品来说，把趣味阅读和训诫的特点相结合是非常重要的。很明显，《十二国》不符合这一要求。尽管从名称上看，它试图收集“战国七雄”和“春秋五霸”共12个国家的材料，但《十二国》不是纯历史的著作。如前所述，这是一部在历史传说的基础上产生、反映中国早期史学传统的历史训诫故事集。这部作品被西夏采用，可能是考虑到为了从劝世角度解释历史事件，就必须推

广中原传统道德并使之流行开来。这样,《十二国》就被列入了通俗解释中原道德的著作综合体。这种著作综合体的形成与儒教在西夏的确立密切相关。

注释:

- ① 《十二国》的名称由春秋五霸加战国七雄得来。
- ② 《宋史·艺文志》,《二十五史》,上海:1987,第12卷,第5811-5812页。
- ③ 比如刘向的《新序》和其他作品按不同题材分类,这传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
- ④ 瓦西里耶夫《战国策》,第123页。塔斯金认为,《国语》是为使其与国家的儒教理论产生巨大联系而专门编订的。参看塔斯金《国语》;《战国策》,上海,1958,第7页。
- ⑤ 有关《春秋》与《国语》的差异,见《国语》塔斯金译本《战国策》,上海,1958,第5-6页;瓦西里耶夫《战国策》,第95-96页。
- ⑥ 《国语》主要叙述春秋时期的故事,而在《十二国》保存下来的部分中主要讲述的是战国时代的故事。
- ⑦ 《韩非子》,《二十二子》,上海,1987,第1143页。
- ⑧ 在《淮南子》中也有关于宓子贱的故事。
- ⑨ 《前汉书·艺文志》,《二十二子》,上海,1987,第165页。
- ⑩ 如淳于髡、徐君平、靖国君、孟尝君等故事被证实可与《战国策》勘同。
- ⑪ 参看《韩诗外传》,《四部丛刊》,上海,1928,第9卷,第203页。
- ⑫ 参看《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北京,1987,第113卷,第83页。
- ⑬ 在儒家《四书》之首的《大学》中,可以找到这一思想更完整的表述。
- ⑭ 《说苑》,《四部丛刊》,上海,1928,第10卷,第19页。
- ⑮ 参看《孔子家语》,《二十二子》,上海,1987,第516页。
- ⑯ 参看《列子》,《二十二子》,上海,1987,第196页。
- ⑰ 《晏子春秋》,《二十二子》,上海,1987,第574页。
- ⑱ 参看《吕氏春秋》“恃君览观表篇”,《二十二子》,上海,1987。

参考文献:

- [1] [2] [5] [13] К. Б. 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J].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 С. 63-66, 65-66, 65, 63.
- [3] К. Б. Кепинг. 《Двенадцать царств》— китайское сочинение сохранившееся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J]. Памятники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стории и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востока, 1974. С. 63;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I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86.
- [4] [11] К. Б. Кепинг. Вновь собранные записи о любви к младшим и почтении к старшим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90. С. 9, 9-10.
- [6] [8] [9]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8] К. В. Васильев. Планы сражающихся царств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45-46, 123, 122-123, 114-115, 123-124, 125, 123, 123, 122, 112-115, 163-164, 112-113, 164, 122.
- [7] [23] В. С. Таскин. Речи царств (Го юй)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7.
- [10] Е. И. Кычанов. Очерк тангу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68. С. 266.
- [12] К. Б. Кепинг. Лес категорий, утраченная китайская лэйшу в тангутском переводе [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83.
- [24] [25] [27] James Legge, The Four Book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 and Notes [M]. Shanghai: The Chinese Book Company, 1930. 6/7. 401, 311-312, 360-361.
- [26] Н. А. Невский. Тангутская филология I [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60. С. 86-87.

(责任编辑 孙颖慧)